

广州构建枢纽型文化网络体系的理论分析与对策研究

（研究报告）

中共广州市委党校课题组

【内容提要】“建设枢纽型网络城市”是广州落实新发展理念、全面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积极融入世界城市体系的重要战略决策。“建设枢纽型网络城市”不仅需要取向现代化和国际化的功能提升，而且还需要思想观念和文明程度的文化提升，迫切需要构建与之相适应的枢纽型文化网络体系。基于改革开放40年来广州文化建设所取得的历史性进步，广州构建枢纽型文化网络体系需要着力构建和完善思想教育体系，以培育“构建枢纽型网络城市”所需要的人文精神；需要着力构建和完善文明素质提升体系，让市民在走向现代化和国际化发展过程中彰显出品行高尚的人格魅力；需要着力构建和完善文化风格传承体系，把广州城市文化所具有的丰富内涵和深厚底蕴充分挖掘出来、彰显出来；需要着力构建和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使广州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更加富足、更加充实、更加温馨；需要着力构建和完善文化产业发展体系，形成文化与科技、与金融、与创意、与制造等融合发展的叠加效应；需要着力构建

和完善文化网络传播体系，使“文化广州”的影响力不断增强。

【关键词】 枢纽型网络城市 文化网络体系 对策分析

“建设枢纽型网络城市”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广州进一步落实新发展理念、全面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积极融入世界城市体系的重要战略决策。这一重要决策在总体思路对接“一带一路”建设、“自贸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国家战略的实施，既符合广州实际，也很有远见。贯彻落实这一重要决策，广州的城市功能和国际影响力将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基本实现现代化和全面实现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城市发展战略确定之后能否得到有效落实关键还要看能否形成广泛的主体共识、能否凝聚推动实施的强大力量。而要解决思想共识和实践自觉问题，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就要有与之相应的文化支持和引领。为此，广州亟待全面提升城市文化建设的质量和效能，要以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对精神食粮的需要为根本目的，以为“建设枢纽型网络城市”奠定坚实文化基础和提供有力文化支撑为着力点，大力构建枢纽型文化网络体系，切实增强广州

走向世界的文化引领力和驱动力。

一、“建设枢纽型网络城市”对文化发展提出的新要求

对于建设在国际上有影响甚至能发挥主导或控制功能的枢纽型网络城市而言，广州迫切需要在城市文化建设上开展一次以思想解放、观念更新、价值引导、心态调适为内容的文化培育、转换和提升，让文化为城市面向未来的新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也迫切需要围绕建设枢纽型城市对文化发展的总体需求，调整文化建设和发展的战略布局，构建支撑广州作为“枢纽型网络城市”走向世界所需要以及相匹配的枢纽型文化网络体系。

约瑟夫·奈提出的“软实力”理论认为，“软实力”（Soft Power）是相对于“硬实力”（Hard Power）而言的，是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的吸引力和同化力。与“硬实力”不同，“软实力”主要通过信仰、精神和道德诉求的传播、示范和引导，去感化、诱惑和说服别人改变某种原有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而接受某些行为准则、价值观念和制度安排。在国际竞争中，“软实力”是一种利用“非强迫手段”来达到自己所愿（目的）的能力，主要包括文化的影响力、意识形态的感召力以及政治价值观与制度安排的吸引力等等，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之所以被广泛推崇，就是因为他超越了

“硬实力”竞争的传统思维，给人们提出需要高度重视“软实力”较量的新视域。虽然在国家、地区乃至城市之间的竞争当中“硬实力”和“软实力”并不能简单分开，但是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突出了文化因素在综合竞争中的重要地位，凸显了推动文化发展、扩大文化影响所具有的功能和作用。这一理论表明：在全球化背景下，谁就拥有强大的文化软实力，谁就能掌握价值判断的话语权，就能让人接受自己的价值观并认同自己所选择的通往未来的“道路”。

在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概念之后，文化发展问题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因为文化既是构成“软实力”的基石，也是“软实力”发挥作用最根本的决定因素。世界各国在“软实力”上的竞争，其实就是文化影响力的竞争。所以，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重视文化发展，努力提升自身的文化影响力，成为许多国家或地区乃至许多城市发展取向未来发展越来越重要的战略选择。这说明文化既不是可有可无的“摆设”，也不是锦上添花的“点缀”，更不是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闲事”。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反作用的基本理论，文化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灵魂”和“价值追求”，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它对于人们的社会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也对人们的社会生活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

在文化建设上，我们党一直高度重视，尤其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强调把解放思想作为先导，把“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贯穿其中，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发展道路，努力文化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任务更加艰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要求更加紧迫。”^①作出这一《决定》表明我们党对文化建设和发展的高度重视，是执政党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的重要决策。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对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又作了一些列新的部署，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强调要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习近平总书记站在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发展大局上反复强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②“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③这充分表明，在当今深入融入全球化、参

^①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1年10月26日。

^② 习近平：《认真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汇聚起全面深化改革的强大正能量》，《人民日报》2013年11月29日。

^③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40-41页，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党已经清醒地认识到能否从“文化强国”的战略高度审视和推进文化建设和发展，不仅意味着有没有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实践自觉，而且还会影响到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成败。

提出“建设枢纽型网络城市”，虽然是以广州城市发展已达到的规模和水平为基础的，但这并不是对广州发展目标作概念上的简单置换。它意味着广州要在如何提升城市功能和如何融入世界城市体系上实现新的突破和新的跨越。这样的突破和跨越无疑是一次深刻的社会转型，不仅要有取向现代化和国际化的功能提升，而且还需要有思想观念和文明程度的文化提升。这就需要从决策者到市民都要有“建设枢纽型网络城市”的理性共识，以凝聚积极参与“建设枢纽型网络城市”的强大精神力量。因为要真正建设成为一个有国际影响力的“枢纽型网络城市”，必需以在文化身份和文化地位上具有能够成为“枢纽型网络城市”的广泛认同为前提。而要满足这一条件，就不仅需要城市文化功能的充分彰显和文化软实力的全面提升，而且还需要将文化建设成果转化为提升现代文明生活品质所要求的社会文化心态与心境。

英格尔斯曾经指出：“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

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就是不可避免的。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人的手中变成废纸一堆。”^①所以，建设枢纽型网络城市一定要以人们在思想观念、价值理念和文化心态的调整和适应为前提。而这样的调整 and 适应不会自然而然地实现的，只有当文化建设能够与建设枢纽型网络城市相适应，它才能为建设枢纽型网络城市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

在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文化引领和驱动发展的功能越来越重要，也越来越凸显。加拿大学者保罗·谢弗把这样的功能形象地比喻为引领社会文明进步的“灯塔”，认为：“它照亮了一条清晰可行的通往未来的道路——一条基于文化的最崇高、最智慧和最杰出的原则和理想之路”^②。在“文化引导未来”的发展背景下，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并已率先发展起来的广州，能否在“改革不停步，开放不止步”的新征程中继续走在全国前列？能否在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以及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发挥核心引擎的作用？能够在迈向现代化和国际化发展的过程中彰显出更有影响力的“广州模式”或“广州形象”？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都离不开能否具有文化的支撑和驱动，离不开在文化建设上能否构建一个可以引领未来发展的“灯塔”。为此，广州在建设枢纽型网络城市的过程中，必须把文化建设

^①英格尔斯著：《人的现代化》，第97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②保罗·谢弗：《文化引导未来》，中文版前言第1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作为一项重要的基础工程来抓。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基础上，着力构建推动城市新发展所必需的文化基础，为落实城市发展新理念，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弘扬改革开放精神，为继续推进改革、在更高水平上扩大开放，提供基于文化共识与思想统一的强大精神力量。要充分认识到，新形势下必须有文化的引领和推动，广州才能在构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等方面走在全国前列。

二、广州“建设枢纽型网络城市”亟待解决的文化问题

经过改革开放 40 年的快速发展，广州的经济社会发展已经取得长足进步。从连接世界的交通设施到蓬勃发展的外向型经济，从日益密切的国际商务合作到日益广泛的国际人文交流，广州的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已经具备建设枢纽型网络城市的坚实基础。然而，从“建设枢纽型网络城市”的发展要求而言，广州还面临许多亟待解决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如城市扩张、人口增长、资源承载有限、环境容量不足，以技术创新和质量提升为主导的集约型发展方式与数量巨大的低端产业所构成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同时并存，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与城市发展总体水平相对不足，现有体制机制改革还严重滞后与推动转型升级的创新实践不相匹配，新老城区和

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要求不相适应，等等。能不能有效地解决好这些矛盾和问题，关键又在于能否在创新发展中摆脱路径依赖，培育新理念、提出新举措、迈出新步伐。如果说“建设枢纽型网络城市”是推动广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走出一条发展新路的重要战略决策；那么，要把这一战略决策贯彻落实好，就需要增强与“建设枢纽型网络城市”要求相适应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从文化建设上为顺利实施这一战略提供缘于主体认知的心理支持、观念引领、精神状态与创新活力。

（一）如何凝聚建设枢纽型网络城市的思想共识问题

“建设枢纽型网络城市”是中共广州市委十届九次全会根据广州城市发展所处的历史新方位、新条件和新机遇，对广州未来发展方向和目标作出的重要决策。市委认为：“建设枢纽型网络城市，是适应全球城市发展新趋势，传承广州城市发展脉络，实现国家赋予广州的城市定位，巩固提升国家重要的中心城市地位的内在要求。要围绕形成层次更清晰、功能更完善、联系更便捷的枢纽型网络城市格局，进一步加强系统整合，科学布局建设城市空间的枢纽与节点、网络与连接，优化城市形态，凸显城市特征，强化城市功能。着力建设国际航运、航空、科技创新三大战略枢纽，形成新的发展动力源和增长极。”^①在这一战略决策当中，“枢纽型网络城市”无疑是关键点和最大亮点。然而，什么是枢纽型网络城市？这是目

^①记者罗艾桦、通讯员史伟宗：《广州提出建设枢纽型网络城市》，<http://society.people.com.cn/n1/2016/0804/c1008-28612363.html>。

前使用并不多见、学界尚缺乏统一认识的新概念，恐怕对于许多市民甚至一些领导干部而言就更不了解了。如果对于基本概念不了解，就可能导致这样或那样的误读和误解。这不仅会影响到人们对广州未来发展的理性共识，而且还会影响到整个战略决策的贯彻落实。而要切实解决好这一问题，除了加强宣传舆论引导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广泛培育统一思想认识的文化基础和理解决策所必需的理论思维。

从理论上说，枢纽型网络城市是指在一定区域乃至全球的城市体系中处于网络联接中心地位、起着枢纽性互联互通作用的国际化城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在全球化进程当中，每个城市都不是孤立，它要通过市场交换与其他城市发生商品、金融、技术、人才、信息等各种各样的交流、合作与互动。随着城市之间的交流、合作与互动越来越密切，城市之间就逐步形成由多个城市组成的城市圈或城市带，再不断拓展为区域之间相互联系的城市群，在全球资源配置的进程中形成参与国际合作与交流的城市网络体系。在这一过程当中，一些城市由于区位优势明显又使自身地位和功能的不断提升，其参与区域合作和国际交流所发挥的作用就越来越突出，功能和影响也越来越大，逐步发展成为城市网络体系相互连接的重要节点，这些城市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心城市或枢纽型城市。在全球城市体系中，枢纽型网络城市一般都是处于核心地位、具有很强的支配与控

制功能、在国际竞争中起着主导作用的结点城市，比如纽约、东京、伦敦、巴黎等都属于这样的城市。因此，把“建设枢纽型网络城市”作为广州城市发展的目标是具有国际视野的发展战略，也是符合城市功能提升规律的发展战略。

从广州的城市发展来看，广州自古就是国家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对外交流的历史源远流长。据史学家们的考证，在秦始皇统一岭南之前，广州已经同南海沿岸有了贸易往来，至汉武帝时期广州的对外交流已经非常频繁。而到了唐代是广州更是全国的外贸中心和世界上著名的商港，为了管理海外交通和对外贸易唐政府设立了“市舶使”。即使在实行全面海禁的明清时期，广州作为对外通商的唯一口岸，成为全国对外贸易和交流的特别“窗口”。鸦片战争之后广州成为被迫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之一，沦为西方列强以不平等贸易大肆掠夺中国资源的要地，这是一段屈辱的历史。新中国成立之后，为了突破帝国主义列强的重重封锁和包围，国家决定在广州举办“广交会”，让毗邻港澳的广州承担着对外经贸往来与文化交流的特殊使命，成为中国与世界联系的桥头堡。改革开放之后，广州更是凭着先行一步的政策优势和对外开放的历史传承，以率先开展招商引资、发展对外贸易为龙头，在经济、技术、文化等方面积极拓展对外交流与合作的空间，着力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新格局，架

起广州与世界紧密相联的一座座通衢之桥。如今改革开放走过了四十年的光辉历程，广州从经济发展实力、基础设施建设、城市管理水平、社会文明程度等方面，都具备了在更高水平上参与全球化发展的条件、底气和优势。在这样的背景下，作出“建设枢纽型网络城市”的决策显然是符合广州城市发展实际的，也是有远见的，对全面提升广州的城市功能和国际影响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因为“构建枢纽型文化网络体系”是基于“建设枢纽型网络城市”的发展要求而提出的，“构建枢纽型文化网络体系”目的是为“建设枢纽型网络城市”提供文化支撑、价值引领和智力支持。如果人们对什么是“枢纽型网络城市”并不清楚，那么要在“构建枢纽型文化网络体系”获得统一的思想认识并形成具有广泛认同的实践自觉，显然就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因此，我们应该从城市发展的现代化、国际化、网络化的必然趋势当中增强对广州“建设枢纽型网络城市”的理性认知，从广州城市发展的历史源流、现实基础和综合实力来坚定“建设枢纽型网络城市”的信心和希望，进而形成对推动“构建枢纽型文化网络体系”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认知，在城市发展的新要求上把文化建设提高到新的水平。

（二）如何解决文化建设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題

文化建设是落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

重要组成部分，实现文化繁荣和发展、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的重要内容。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①，文化建设和发展的任务已经越来越迫切。对此，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②应该说，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的文化建设和发展取得的显著成就，尤其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和完善方面有了根本性的改变，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可以得到宽领域、多样性、多层次的需求满足，各种类型的群众文化活动丰富多彩。但是，由于文化发展本身所具有的历史性、特殊性和复杂性，目前文化建设和发展总体上还相对滞后，与经济发展的“硬实力”相比还存在“软实力”不足的突出问题。

就广州而言，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十二五”期间文化建设达到了一个新水平，发生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变化，主要表现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迈上新的台阶、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发展活力进一步增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取向优质化发展、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并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

^①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1年10月26日。

^②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40-41页，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性产业等等。但是，也要看到广州的文化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水平相比还存在较大的不平衡性，文化发展的滞后性比较突出。主要表现在：城市文化风格和特色不够鲜明，人们习惯于将广州看作是集市发达、生意兴隆的“不夜城”，而对其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知名度和认同度并不高；推动城市文化发展的总体布局还不清晰，尤其对如何推动文化建设与经济社会的融合发展缺乏全局性、框架性的思路和抓手，文化建设和发展的单一化、部门化和项目化特征明显；对公共文化事业发展的经费投入相对不足，新旧城区和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不均衡，服务能力、服务品质和服务效能差距较大；文化体制改革的力度还不够大，文化管理体制机制不够灵活，高端文化人才集聚度较低，文化发展的创新活力没有充分激发；文化市场的开发和培育还不够充分，缺乏有市场占有率和影响力的文化产品，在国内外获奖的精品力作也不多，城市文化影响力有限；在文化产业发展中带动力强的龙头企业还不多，文化创意产业“小、散、弱”的局面没有完全改变，文化发展的品牌、规模和水平都缺乏足够的竞争力；市民总体的文化素质有待提升，文化消费需求仍主要停留在大众普及性的层次当中，有些文化娱乐还存在不少庸俗、低俗和媚俗现象，对推动文化发展取向高品质发展缺乏主动性、积极性和创新性；等等。这些问题或“短板”的存在，无疑会影响和制约人们对广州“建设枢纽型网络城市”的文

化认同和文化信任。

解决文化发展滞后于与经济社会问题，关键要在全社会树立城市发展要以文化论输赢的理念，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和发展对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和驱动功能，切实把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一起布局，使之相互协调、同步推进、整体落实。在推动文化建设和发展过程当中，文化主管部门当然要负总责，也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和担当。但是，文化建设和发展不能囿于文化部门的职能范围来讨论和布局，文化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牵涉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需要党委政府各个部门共同树立推动文化协同发展的主导意识，共同参与文化建设的系统谋划，高度重视自己工作与文化发展的相关性，对涉及文化发展的各项工作能够主动担责、积极推动、很抓落实。要在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领导下，让全社会都高度重视文化的建设和发展，共同营造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良好氛围。通过各部门的相互配合、联合作为和社会主体的广泛参与，全面提升广州城市文化建设和发展的整体水平。在文化与经济融合发展的过程当中，全社会都应积极倡导对文化和文化人才的尊重，不断强化提升文化品位的主体自觉。

在社会进步过程中，文化既传承人类文明丰富而深刻的内涵，也引导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方向，还决定人们社会生活所具有的品质。如果说不同

的时代都有其不同的文化内涵和文化特征,那么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发展文化也必然要发生与之相应的历史性变革。随着人们社会生活的主体性意识不断增强,其所具有的文化意识会越来越成为行为选择是否具有合理性的判断依据。就未来发展的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而言,不同的文化意识必然带来不同的主体效应和不同的发展结局。对此,亨廷顿曾经就韩国和加纳在发展水平上存在的巨大差异做过分析,认为文化(尤其是价值观)的不同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①。从这一意义上说,只有站在文化引导未来的战略高度去认识和理解文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和驱动,才可能自觉把文化建设和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一起布局,并把文化建设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同时,也只有当文化的价值被充分认识并摆到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文化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良性互动才可能真正形成。基于这样的认知,在建设枢纽型网络城市的过程中广州就需要通过“构建枢纽型文化网络体系”来推动文化建设的新发展,充分发挥文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和驱动作用,以形成文化优先发展和适度超前发展的新局面。

(三) 如何增强参与国际竞争所需要的文化自觉问题

“对于城市发展而言,如果说以往的文化建设起到的更多的是类似‘花瓶’的作用,是体现繁荣的配角,那么未来一个阶段,文化对于城市的意

^① [美]塞缪尔·亨廷顿、劳伦斯·哈里森主编《文化的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前言第1页,程克雄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

义将更多体现在实际的要素推动乃至城市发展‘软实力’的表现上。”^①按照凯恩斯的投资乘数理论，在某种边际消费倾向相对确定的条件下，新增加的投资量，如果经过一定时间之后其导致收入与就业量的数倍增加，甚至会产生数倍于投资量的 GDP，那么这样的产业就是值得投资的优势产业。那么，文化产业的投资乘数效应如何呢？新加坡国立大学商业研究中心的研究发现，文化创意产业的投资乘数达到 1.66，高于银行业（1.4）和石化工业（1.35）的投资乘数。^②这说明文化创意产业是当今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内容和基本趋势。文化创意产业的投资乘数如此之高，也表明这样的产业是对城市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推动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正因为文化所具有的产业属性，文化发展能够直接带来经济效益的提升，所以，各个城市都非常注重文化产业尤其是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

然而，文化对提升城市竞争力的功能和作用并不仅仅表现为文化产业本身所带来的经济贡献，其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文化作为“软实力”所具有的聚合力和认同度对城市参与全球竞争的影响。一个城市的文化发展（包括文化产业的发展）水平高低，直接影响其在国际交往中的地位 and 优势。纽约、伦敦、巴黎、东京等作为世界城市的国际影响力也并不仅仅因为其具有强大的经济竞争实力，其文化发达所形成的强大“软实力”也是

^①屠启宇主编：《国际城市发展报告》（201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9页。

^② Arun Mahizhnan. The Economic Impact of Cultural & Creative Industries, Working Paper of LKY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nus.

不可忽视的。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目前像伦敦和东京这样的国际先进城市依然还高度重视自身的文化发展。伦敦先后发布了《文化大都市——伦敦市长 2009-2012 年的文化重点》以及《文化大都市——2012 年及以后》等文化发展战略，东京制定了《东京未来 10 年》等文化发展规划。伦敦和东京这些已经处于国际城市网络体系核心地位的城市之所以还要制定自己的文化发展战略，就是担心其在激烈的城市竞争当中可能丧失已有的优势。因此，在全球化背景下后发型城市要想赢得国际竞争的重要地位和发展优势，就需要在提升文化软实力上下功夫，用文化创新发展所形成的各种要素资源集聚效应来带动城市文化功能的拓展与辐射，以扩大自己的全球影响力。

如果说各个城市纷纷重视自身的文化发展，制定文化发展战略和规划，是希望在激烈的国际城市竞争中获得自己的发展优势；那么，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过程中，广州提出“建设枢纽型网络城市”的目的在于更有效地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融入国际化发展的城市体系，就更加需要重视和加强自身的文化建设。应该说，在国际间的城市交往中，广州一直注重提升自己的文化影响力，比如充分利用“广交会”这一参与国际经贸往来的重要平台作为提升文化影响力的重要品牌；2010 年利用举办了第十六届“亚运会”和首届“亚残运会”的机会，向亚洲人民乃至全世

界展示了改革开放以来广州的经济实力、城市面貌和文化活力，让这座具有两千二百多年的历史文化名城所具有的文化魅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彰显，亚运之后的广州经过“干净、整洁、平安、有序”的综合治理，在城市面貌得到进一步优化和美化的同时，文化建设和发展也呈现出许多新气象；利用举办“2017 广州《财富》全球论坛”的机会，以“花开广州、绽放世界”为主题再次向世界展示“千年商都”的深厚底蕴、现代活力和发展潜力，引起全球媒体的广泛关注，形成“广州”被全世界刷屏的传播效应。但是，不论是从国家中心城市应当具有的文化功能来看，还是从建设枢纽型网络城市的文化要求来看，广州目前文化建设和发展的水平以及城市所内涵的文化品质都还需要大力提升。因此，要从国际视域来审视广州文化建设和发展的未来走向，通过制定包括集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规划于一体的一系列文化发展措施，来加快推进广州的文化建设和发展。当前，尤其要通过构建枢纽型文化网络体系的总体布局，着力强化参与国际竞争所需要的文化自觉，推动广州的城市文化建设和发展全面见成效、全面上水平、全面显张力。

三、构建枢纽型文化网络体系的基本内容和目标要求

构建枢纽型文化网络体系，是广州为适应建设枢纽型城市的发展要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和推进文化建设提出的一个新概念。对于这样

一个新概念，目前并没有进入学术视野，更谈不上有公认的理论范式。就认识规律而言，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认为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和目的，也是检验真理性认识的唯一标准，在推动城市发展的具体实践中提出新概念、新认识和新思想都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如果对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不作必要的学术界定，就容易对它产生误读或误解，进而会影响到对它的落实效果。为此，我们应当从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的双重维度来认识和理解这样一个包含时代和实践发展新要求的新概念，并用学术的理性思维来读解其应当包含的内涵和外延，以给出一个能够被大家认同和接受的思想逻辑及理论规范。

从概念构成上看，“枢纽型文化网络体系”是一个复合型结构的综合性概念，需要进行多层次的学术梳理。按照逻辑学的概念分析方法进行梳理，这一概念至少包含“枢纽型”和“文化网络体系”两层意思。就“枢纽型”的内涵而言，它应当是指文化建设和发展的总体水平和综合实力显著提高，要与建设枢纽型网络城市的要求相适应，在区域乃至全球城市体系中能够处于“文化中心”或“枢纽”地位，具有完善的促进区域或国际文化交流的组织体系、服务机构、市场体系和中介平台，可以推动各种文化要素以不同方式形成产业链接的聚核效应，在城市文化功能上表现出强大的影响力和辐射力。就“网络体系”的内涵而言，它应当是指城市文化

建设和发展要在结构和功能上形成具有自组织体系的网络化系统，它体现一个城市文化建设和发展所达到的基本规模和状态。这其中既要有包括图书馆、博物馆、纪念馆、艺术馆、科学馆、展览馆、影剧院等物质性基础设施所构成的载体型网络系统，也要有包括城市人文精神、市民文化素质、文化艺术创作、文化产品生产、文化艺术表演、文化市场环境、文化人才集聚、公共文化服务等非物质性要素所构成的功能型网络系统。把“枢纽型”和“网络体系”这两者的内涵综合起来，可以说“枢纽型文化网络体系”就是指一个城市的文化建设和发展需要有作为“文化中心”或“文化枢纽”所具有的文化网络体系和功能，在全球化背景下能够彰显出“文化枢纽”所具有的区域性乃至国际性的文化影响力和辐射力。

按照枢纽型文化功能的不同体现来划分，枢纽型文化网络体系可以分为文化教育网络体系、文化传播网络体系、文化市场网络体系、文化交流网络体系、文化服务网络体系、文化设施网络体系、文化传承网络体系、文化产业发展体系等等。这其中每一个具体的文化网络体系还可以进一步细化，比如文化教育网络体系可以按照不同的对象分为儿童文化教育体系、青少年文化教育体系、成人文化教育体系等等，在这里就不作进一步探讨了。总的来说，枢纽型文化网络体系应当属于文化社会学需要研究的范畴，它涉及城市文化功能的提升和社会文化发展领域的分析与测评。

就推动城市文化建设和发展的实践要求而言，构建枢纽型文化网络体系作为广州提出的目标和方向，它包含两个重要的考量维度：其一要从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文化诉求来考量，在城市文化功能上要进一步强化广州作为广东省会城市和华南文化中心的重要地位，并且把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应当具有的文化网络体系构建出来、彰显出来。其二要从建设“全球区域文化中心城市”的国际化发展视域来考量，要把广州在全球化背景下广泛参与国际城市之间的交流、合作需要培育的文化网络体系构建出来、展现出来，充分发挥广州作为重要“文化枢纽”应当具有的影响力、引领力和带动力。因此，在实践层面上构建枢纽型文化网络体系也需要从系统工程的维度来理解——即要从城市发展规划的总体布局上强化文化建设和发展的整体性、系统性、协调性，不能把文化建设仅仅作为城市发展的一个要素来看待，更不能仅在某些文化项目上做文章，把加强文化建设简单理解为文化基础设施的项目建设。换言之，构建枢纽型文化网络体系就是要防止在文化建设上出现“单打一”或“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片面性和简单化，而要把文化建设作为城市发展应当具有的功能配置来认识和布局，要全面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

首先，构建枢纽型文化网络体系在整体性上要全方位推进文化建设和发展，全面提升城市文化的综合实力。可以说，不论是“枢纽型”还是“网

络化”、“体系化”，文化的整体性布局和功能提升都是题中应有之义。一方面，要关注城市文化建设和发展的，从城市文化建设涉及各个方面和全面提升城市文化综合实力上对加强城市文化建设进行总体布局，针对城市文化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或弱项给出整改措施，补不足发展“短板”，推动城市文化发展走向全面繁荣兴盛。另一方面，要研究城市文化建设和发展的规律，从文化建设和发展的要素安排转向功能布局，既要强化城市文化建设的外在构成风貌——如健全和完善文化基础设施等，更要提高城市文化建设的内在品格优势——如提高居民思想文化素质、丰富城市文化内涵、培育城市人文精神等，让物质形态的文化建设和非物质形态的文化建设相互适配、相得益彰、形成合力，以推动城市文化综合实力的整体提升。因而，从整体性来理解，构建广州枢纽型文化网络体系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推动城市文化建设和发展走向全面见成效、全面上水平、全面显张力。

其次，构建枢纽型文化网络体系在系统性上要把推动城市文化建设和发展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来布局。它不能停留在“新瓶装旧酒”的概念解读和路径依赖上，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创新，转变城市文化建设和发展的传统观念和思维定势，把枢纽型文化功能的要求全面融入到建设枢纽型网络城市的总体规划当中，凸显文化对促进城市功能提升的基础性和主

导性作用。换言之，构建枢纽型文化网络体系要在完善和优化文化结构与功能上下功夫，从完善网络体系的系统功能布局上来考虑推进城市文化建设和发展的统筹协调，不能顾此失彼、畸轻畸重；要从枢纽型网络城市应当具有的文化功能和张力来考量和提升文化建设和发展的规模、水平与效果，分析文化系统在体系建设上需要达到的完备程度和功能发挥的具体要求，不能只务虚不务实或者重硬件轻软件；要切实把文化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全过程，着力从“文化+创意经济”、“文化+金融服务”、“文化+科技创新”、“文化+旅游发展”、“文化+社会治理”、“文化+生态建设”、“文化+乡村振兴”等方面探索推动文化建设和发展的新模式、新路径，充分发挥文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

再次，构建枢纽型文化网络体系在协调性上要把城市文化建设和发展按照结构和功能的最优协同进行自组织体系的自我调适。协调性概念（coordination）主要是指一个有机系统的各要素之间在运动过程中体现出的相互配合、彼此协同所达到的一致性与平衡性，能够呈现出艺术性、韵律性的优雅状态。增强系统的协调性需要训练并强化各要素（如肌肉群）之间有相互支撑的合理力度以及彼此配合的默契程度。把协调性放到构建枢纽型文化网络体系上来审视，就需要考虑至少两个方面之间的协调，即

文化体系内的协调和文化体系外的协调。作为文化体系内的协调而言，需要从枢纽型网络城市建设的要求上增强文化建设自身的要素协调与功能协调，从全面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的总体要求出发，把文化建设和发展的各个要素系统进行自组织体系的配套建设与相互协同，对相互配套的系统功能进行合理优化。这既需要在硬件建设与软件建设的相互协调上下功夫，也需要在文化保护传承与文化创新能力建设的相互协调上下功夫，更需要在增强文化发展活力与提升公共文化服务能力的相互协调上下功夫，以便让文化建设所达到的规模、水平能够与建设枢纽网络型城市对文化功能提出的要求相适配。作为文化体系外的协调而言，需要从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相互协调来考量枢纽型网络城市建设需要达到的功能适配。枢纽型网络城市建设无疑是在经济实力增强之后其可能性才能够增强，但是仅靠单一的经济发展又不可能真正成为被认可的枢纽型网络城市。尤其在当今文化发展水平和实力已经越来越成为衡量城市综合竞争力重要因素的国际背景下，枢纽型网络城市的建设就更离不开文化建设的辅助与支撑。因而，在建设枢纽型网络城市的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与之相适应的枢纽型文化网络体系建设问题，要切实推动城市文化功能与城市经济功能、政治功能、社会功能、生态功能之间的相互协调。也就是说，如果城市文化建设严重滞后或文化功能严重不足，

那么就不仅枢纽型网络城市发展的文化形象和文化品位会受到影响,而且枢纽型网络城市的国际竞争优势也会受到制约。

从这一意义上说,构建枢纽型文化网络体系需要党委政府的各个部门以及全社会都要有承担文化建设的共同责任,以形成党委政府主导文化建设、全社会共同参与文化建设的协同力量。不能把“构建枢纽型文化网络体系”狭义地理解为仅仅是文化主管部门和文化单位的职责和任务,大家都需要有把文化发展理念和具体要求融入自己工作之中的主体自觉。构建枢纽型文化网络体系也要努力营造文化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共享”的社会氛围,让“兴文化”成为全社会的广泛共识,更让过上美好生活的文化追求成为投身文化强市建设的精神动力。

四、广州构建枢纽型文化网络体系的路径选择和对策建议

提升广州“建设枢纽型网络城市”的文化支撑,需要高度重视文化建设的全局考虑和系统安排。当前,应围绕市委提出打造“全球区域文化中心城市”的发展目标,在全面提高社会治理智能化、科学化、精准化水平的同时,着力构建体现广州文化发展水平的枢纽型文化网络体系,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为广州城市建设迈向国际化的新发展和提供精神动力、价值引领、文化驱动。

(一) 着力构建和完善以彰显人文精神为核心的思想教育体系

党的十九大提出：“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要提高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①从国家层面来看，“一个国家的社会能力主要体现为该国的文化进步能力和民众的整体素质与水平，社会凝聚力的组织动员能力，以及社会制度化水平和社会秩序，而所有这些均取决于该国整体的文化创造能力，一种能够不断超越自身文化局限的能力。”^②一个国家是如此，对于一个城市的发展而言也同样会是如此。在城市之间文化软实力的竞争当中，文化资源的拥有、文化人才的比例、文化设施的齐备、文化产品的生产都是重要因素，但更重要的还在于一个城市的人文品格和精神风貌所达到的文明境界，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化聚合与提升能力。换言之，“一个城市的文化形象虽然离不开其物质文化所展现的外在景观，但相对于外在形象而言其内在的文化精神则更具有决定意义。我们评价一个城市的文化形象首要的是看这个城市是否具有文明高尚、积极向上、理性平和的精神气质。”^③为此，广州在推进枢纽型文化网络体系建设过程当中，应当着力构建和完善思想道德教育网络体系。由市委宣传部门统一组织，党政机关共同参与，形成市、区、街道社区三级宣传教育协同引导体系，协同引导全社会广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不断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弘扬民族精神和时

^①习近平：《决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42页，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②胡惠林：《当前中国文化战略发展的几个问题》，《艺术百家》2011年第6期。

^③李仁武：《提升城市文化形象的对策分析——基于广州实践的若干思考》，《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

代精神。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重点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广州城市人文精神的培育当中，融入社会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使之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当前，尤其要把“诚信、友善、文明、和谐”等内容融入广州城市人文精神建设过程当中，既大力弘扬广州作为“千年商都”本来就具有的诚信传统与友善之风，又充分表达出广州走向现代化、国际化发展需要培育和提升的文明素养与和谐氛围，让具有岭南文化鲜明特色的“文化广州”获得广泛的国际认同，使“建设枢纽型网络城市”的文化品格和文化功能得到充分彰显。

（二）着力构建和完善以增强价值认同为核心的素质提升体系

从城乡对比的角度来看，“城市是一个相对永久性的、高度组织起来的人口集中的地方，比城镇和村庄规模更大，也更重要。”^①从社会文明进步的角度来看，“城市既是人类文明的成果和标志，又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家园。”^②对于一个城市的发展而言，不论确定什么样的发展目标都不能脱离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和人们日常生活水平提升的必然要求，否则发展目标就不可能得到广泛的社会认同，就会失去人们在思想上和心理上的认同，也就不可能有行动上的拥护与支持，推动其发展的内驱力就非常有限。从这一意义上说，广州“建设枢纽型网络城市”不仅需要在城市

^①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第132页，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

^②李仁武：《提升城市文化形象的对策分析——基于广州实践的若干思考》，《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

功能上体现作为国际航运、航空、科技创新三大核心枢纽应当具备的物质条件和融入国际城市体系的网络节点优势,更需要在这一过程中增强人们对“建设枢纽型网络城市”的文化认同,把“建设枢纽型网络城市”所具有的文化意义展示出来,把“建设枢纽型网络城市”的预期目标与市民对未来美好生活的热切期盼统一起来,这是把战略决策转化为实践自觉所必需的公共价值理性。为此,广州在“建设枢纽型网络城市”的实践过程中,应当着力建构和完善市民文明素质提升体系。由市委宣传部门统一组织,全市教育、文化等部门共同参与,高等院校、职业学校、电视大学、社区大学、职工大学等施教单位落实培训项目,形成全体市民可共享的常态化知识更新培训网络。当前,要着重依托全媒体开展新闻舆论引导,把建设枢纽型网络城市的目标追求与建设美好家园的价值判断统一起来,从思想理念上增强市民热爱城市的家园意识并基于文化认同的自豪感,让每个广州人在参与现代化和国际化发展的文化交往中都体现出彰显出品行高尚的人格魅力和具有文明素养的精神风貌,洋溢着充满文化自信、文化自觉和文化自强的亲和力、感染力和凝聚力。

(三) 着力构建和完善以文化遗产保护为核心的风格传承体系

文化基础是人们从事社会活动的基本条件,也是社会行为是否具有合理性的重要依据。一般而言,文化基础好容易形成公共价值理性,因为社

会成员之间可以在相互学习和交流当中形成广泛认同的价值判断。如果没有任何文化基础，许多社会行为的发生都是不可想象的。在文化基础所包含的内容和要素当中，文化遗产是一块极其重要的基石。不论是物质文化遗产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人类知识、智慧和能力的结晶，铭记着历史进步和发展的演进过程。文化遗产作为人类文明的文化遗产，体现在城市的文明发展过程中，它是城市发展的历史见证，体现出一个城市文化底蕴的深厚和文化内涵的丰富。在城市发展过程中，文化遗产标征着城市文明演进所走过的重要历程，凝聚着人类创造历史的时代特色。作为人类的共同财富，文化遗产又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和相互合作的心灵纽带。对于一个历史文化名城而言，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同等重要、不可或缺，透过文化遗产可以看出一个城市具有怎样的文化内涵以及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曾经有过哪些重要贡献。加强文化遗产保护，才能延续一个城市发展的历史记忆，才能保持其文化遗产的根脉，为城市发展找到可以依托的文化支点。广州在“构建枢纽型文化网络体系”的具体实践中，应当着力建构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网络体系。要以文化管理部门为统领，建立有各文物保护单位牵头，形成政府、民间组织、文物爱好者、非遗传承人、社会研究团体共同参与的保护体系。要通过历史文化遗产与历史城区、文化街区融为一体进行系统性保护，不仅把广州

作为“古代丝绸之路发祥地”、“岭南文化中心地”、“近现代革命策源地”和“改革开放前沿地”的文化遗产清理好、保护好，而且还要把广州城市文化所具有的丰富内涵和深厚底蕴充分挖掘出来、彰显出来，通过加强文物保护的数据平台建设和博物馆体系建设，实现文物保护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和文物保护成果的社会共享，以体现广州城市的文化风貌和独特魅力。当前，尤其把广州在历史上对外开放、交流与合作的文化记忆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为“建设枢纽型网络城市”提供具有历史价值和借鉴意义的文化基础。

（四）着力构建和完善以提升能效为核心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城市文化功能和作用的发挥是需要有文化空间和文化服务作为基本保障的。一方面，城市需要有开展文化活动的基础和条件，才能让市民广泛参与到文化活动当中，获得各种文化和艺术的感染与熏陶，体验和品味缘于生活的人生意义与价值理解。另一方面，城市需要有承载文化传播与交流的途径和平台，才能让城市的文化个性和文化张力可以充分体现出来，城市交流与合作当中获得跨文化的相互认同、相互尊重、相互促进。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在“十二五”期间，广州的公共文化事业发展取得的成绩非常突出和显著，广州歌剧院、广州图书馆新馆等一批新建文化场馆投入使用，已成为广州文化发展的新地标。其中，广州图书馆的服务水平

和服务能力在全国处于领先水平，日均接待读者量达到2万人，成为城市图书馆接待读者量的世界第一。但是，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当中城乡差距还比较明显，尤其是新城区在文化基础设施、人员队伍、素质能力等方面相对滞后，严重制约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标准化和均等化发展，公共文化服务的质量和效能与市民日益提升的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还有较大差距。当前，发展公共文化事业的重中之重是“要以公共财政为支撑，以公益性文化单位为骨干，以全体人民为服务对象，以保障人民群众看电视、听广播、读书看报、进行公共文化鉴赏、参与公共文化活动等基本文化权益为主要内容，完善覆盖城乡、结构合理、功能健全、实用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①因此，广州在“构建枢纽型文化网络体系”的具体实践中，应当着力构建和完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体系。要以公共文化基础设施体系建设为基础，通过优化城市公共文化设施布局，构建以标志性文化设施为龙头、特色基层文化设施为枢纽的市、区、街（镇）、社区（村）四级公共文化设施网络体系，进一步推进公共图书馆、文化馆总分馆体系建设，统筹配置市、区、街（镇）公共文化资源，构建“标准化”、“均等化”、“优质化”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断优化和提升公共文化服务的质量和效能，使广州市民在“建设枢纽型网络城市”的过程中精神文化生活可以更加富足、更加充实、更加温馨。

^①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1年10月26日。

（五）着力构建和完善以提升量级为核心的文化产业发展体系

发展文化产业是城市文化建设和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抓手。文化产业的发展可以大量吸引文化发展资金、人才、技术的集中和集聚，形成文化产业与传统产业融合发展的叠加效应，推动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发展文化产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满足人民多样化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按照全面协调可持续的要求，推动文化产业跨越式发展，使之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支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为推动科学发展提供重要支撑。”^①在当今城市发展的战略当中，许多城市都把文化产业尤其是文化创意产业纳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布局当中，并作出具体规划、制定行动方案。因此，广州在“构建枢纽型文化体系”的具体实践中，应当着力构建和完善文化产业发展网络体系。要围绕“建设枢纽型网络城市”的战略实施，制定并出台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具体行动计划，抓住信息技术新发展背景下创意产业正在蓬勃兴起的新机遇，在财政政策扶持、融资信贷支持、人才队伍建设、体制机制引导等方面，大力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全产业链布局，实施“文化+”

^①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1年10月26日。

战略，促进文化与商贸、旅游、体育、会展等产业的融合发展，打造若干在国内外具有较高品牌影响力和市场占有率的文化产业集群。当前，最为重要的是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市场管理的体制机制创新，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促进文化人才的集聚和文化资源的合理利用，繁荣和壮大文化市场，引导和扩大文化消费，实施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品牌战略，不断提升广州文化产品生产的原创力，彰显广州文化产业发展的品牌效应。尤其要高度重视广州在粤剧乐曲、广东音乐、岭南书画以及“三雕一彩一绣”等方面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独特优势，推动在岭南文化精品在海外华侨华人当中的广泛传播，让广州成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引领者。

（六）着力构建和完善以提升城市形象为核心的文化传播体系

城市文化形象是人们对城市的主观印象，是通过大众传媒、个人经历、人际传播、记忆以及环境等因素的共同作用而形成的。然而，“不论任何特定文化背景上的城市，其实质在一定程度上都代表着当地的以及更大范围内的良好生活条件的性质。”^①事实上，每个人在城市生活的重要意义也在于“城市中可以生活得更好。”^②从这一意义上说，“城市本身变成了改造人类的主要场所，人格在这里得以充分的发挥”，“从城市走出来

^①刘易斯·芒福德著：《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第118页，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

^②刘易斯·芒福德著：《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第118页，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

的，是面目一新的男男女女”^①。在日常生活实践中，人们对一个城市的看法总是通过不断重复的传播行为对有关某个城市的一整套象征性的文化符号进行具象认知，才逐步形成并巩固对它整体形象的认知和文化意义的理解。广州建城已有二千二百多年，是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从历史的视角看，广州作为岭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一直保存着岭南文化最深厚的传统、底蕴、个性与特质。不论是“南越王宫署遗址”、“南越王墓”、“五仙观”，还是“三元宫”、“西来初地”、“华林寺”、“光孝寺”、“怀圣寺”、“先贤古墓”、“南海神庙”，抑或是“黄埔古港”、“沙面”、“十三行”、“万木草堂”、“大元帅府”、“中山纪念堂”、“黄埔军校”等等，这些无一不彰显着广州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厚重，表达着这座城市以岭南文化为核心兼容并蓄而产生的由多元文化相互激荡、相互影响、相互融合所产生的强大聚合效应。但是，与北京、上海、西安、杭州等文化都市相比，人们似乎总感觉广州“缺文化”甚至“没文化”。原因何在呢？恐怕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文化形象的传播不足，不能让人对广州城市文化所具有的广度和深度有较为充分的认知。因此，广州在“构建枢纽型文化网络体系”的具体实践中，应当着力构建和完善城市文化的传播网络体系，要以宣传部（外宣办）为主导和统领，加强与各新闻媒体和网络机构合作，充分利用现代传播手段、途径

^①刘易斯·芒福德著：《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第117页，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

和方式，整合政府、企业、机关、学校、市民等多元参与的城市文化宣传队伍，形成城市文化传播的集群效应。当前，迫切要通过全市的统一规划和布局，把文化渗透到经济发展、城乡布局、公共服务、社区治理、环境美化等城市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把广州这座城市的文化品格既通过城市建筑等各种物化形式，如广州图书馆、广州大剧院、星海音乐厅、广州塔、广州国际会展中心等文化地标展示出来，又通过举办“广州亚运会”、“广州《财富》全球论坛”、“广州马拉松”等各种有影响力的文化活动把广州人的精神面貌展示出来。要加强对“城市亮点”和“城事话题”的深度传播，让国内外媒体和网络传播机构有更多机会宣传和推介广州，让世界更多了解广州的同时，使广州城市文化的内涵得到不断诠释、文化形象得到不断提升。

[参考文献]

- (1) [美]刘易斯·芒福德著：《城市文化》，宋俊岭等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年版。
- (2) [美]刘易斯·芒福德著：《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宋俊岭等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
- (3) 杨苗青等主编：《文化都市：大城市以文化论输赢》，广州出版社2002年版。
- (4) 屈哨兵等主编：《中国广州文化发展报告（201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
- (5) 屠启宇主编：《国际城市发展报告（201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 (6) 鲍宗豪著：《国际大都市文化导论》，学林出版社 2010 年版。
- (7) 贝淡宁等著：《城市的精神——全球化时代，城市何以安顿我们》，吴万伟译，重庆出版社 2012 年版。
- (8) 苏永华著：《城市形象传播理论与实践》，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
- (9) [加]保罗·谢弗著：《文化引导未来》，许春山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年版。

(执笔人：李仁武)